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龚自珍



一、浊世美少年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坐落在钱塘江畔、西子湖边的杭州，自古就号称东南形胜之地，山川秀美，民殷物阜，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侠客志士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交游、击剑吟啸，留下了许许多多关于他们的传说故事。

清朝乾嘉年间，正是史称“康乾盛世”的末叶，富丽繁华的气氛还未散尽，在杭州城东马坡巷，有一座深宅大院，宅子的主人姓龚名丽正，是这一带有名的才子。

这龚家乃杭州的名门望族，据说其祖籍河北涿州，南宋时渡江南下，先居住在浙江余姚，后来迁入杭州，著籍仁和（今杭州），到龚丽正这一辈，龚家已在这里生活了400多年。几百年间，龚家人丁兴旺，才子辈出。龚丽正的曾祖龚茂城，是太学生。祖父龚斌为邑增生。龚茂城、龚斌二人都以人品出众，学问精深受到乡里推重，故被朝廷封为六品朝议大夫。龚斌有5个儿子：敬身、澡身、禔身、理身、治身。长子龚敬身，读书考试，一帆风顺，先中举人，再中进士，先在京师担任内阁中书等职，后被派往云南担任楚雄知府，不久升任云南迤南兵备道。任职期间，办事公正，为官清廉，关心百姓疾苦，故很受地方的尊敬。后因父母辞世，遂辞官回乡。现在马坡巷的这座宅子便是他辞官回杭州后所置。

龚敬身无子嗣，其弟禔身却有4男2女，为此，龚禔身便将次子丽正过继给哥哥为子，这样，龚丽正便成为龚家长房的长子，后来也做了马坡巷这座宅子的主人。

1792年8月22日，天气晴朗，马坡巷龚府里显得很紧张，家人们进进出出，匆匆忙忙，人们都在等待着什么。原来龚丽正的第一个孩子就要降生了。中午，后院房内传出一声婴儿清脆的啼哭声，不一会传出话来，说夫人生了一个男孩，母子平安。全府上下很快欢腾起来，龚家的长孙出世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小公子渐渐长大，人们发现这孩子特别惹人喜爱，长得鼻直口方，圆圆的脸，红扑扑的，笑起来如同一朵绽开的桃花，两只眼睛水灵灵的，炯炯有神。最奇的是头顶竟有4个漩，人人见了都说罕见。

这个小公子便是晚清杰出的思想家、诗人龚自珍。

尊循祖辈父辈走过的道路，龚自珍从小就得学习四书五经，练习做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尔后由翰林院再入朝为官，在朝堂上则规谏皇帝、议论政事，到地方则勤于政事，治理好地方，最终做一代名臣。的确，龚自珍的上一代人是这样走过来的。他的亲生祖父龚禔身，也是进士，并入朝为官，受人尊敬。其父龚丽正，在自珍四岁时中举，五岁时中进士，被授以内阁中书之职。因政绩颇佳，一路升迁，最后官做到江苏省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自珍的叔父龚守正则做到礼部尚书。

在走科举做官这条路的同时，在学问上，龚自珍的父辈们也为他作出了榜样，那就是吟诗作赋，写考据文章。龚敬身著有《桂隐山房遗稿》，龚禔身著有《吟矚山房诗》，龚丽正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等。而龚自珍的母亲段驯则是著名的乾嘉考据学大师段玉裁的爱女，段驯受家庭熏陶，也能写一手好诗文，著有《绿华吟谢诗草》。

然而，时代不同了，展现在龚自珍面前的是一个即将发生翻天覆地、千古未见的大变局的世界。

嘉庆之世，繁华盛世已成云烟，国内政治腐败，官吏贪污受贿横行，他们整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当时人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被视为清官的人尚且可以聚敛到这么多财富，那贪官从老百姓头上搜刮到的财富就更难以计数了。另一方面，老百姓的生活却极为艰难，土地丧失，无家可归，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穷困哀苦，无以自存，困苦中的人们不得不组织起来，与那些贪婪横暴的统治者作斗争以争取生存。这样各种各样的秘密会社迅速发展起来，白莲教、天理教等纷纷在全国各地进行活动，收罗成员，宣传反清主张，不断发动武装起义。最使统治者震惊的起义，是天理教首领林清率众攻打皇宫的那一次斗争。

1813年秋，林清带领200人秘密潜入北京，他们以头裹白色巾帕为号，在皇宫内参加天理教的太监接应下，分两路从东、西华门冲入紫禁城。当时嘉庆皇帝不在北京，宫内守军又无防备，结果被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消息传至上书房，皇子是宁（后来的道光皇帝）急忙命人调来军械，组织军队与冲入宫内的起义军进行厮杀。起义军由于人单势孤，又无外援，最后全部被捕或牺牲。直至今日，当初起义军射在隆宗门匾额上的一支箭头仍然留存在上。这次起义使嘉庆皇帝和大臣们整日胆颤心惊，坐卧不宁。

暮气沉沉，没有生机，一副大厦将倾的凄冷景象，这便是龚自珍生活时代清王朝的缩影。

在内忧不断的同时，清朝的外患也日益严重。自清中叶开始，欧洲殖民者的炮舰已经在中国沿海游弋了，而北方则常能听到殖民者掠夺东方的枪声。英国人自从在印度洋立住脚跟，随后就把目光瞄准了中国。当时的清朝拥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几亿的人口，庞大的市场，殖民者既想向这个国家倾销工业品以赚取高额利润，又想从这块土地上掠夺他们垂涎已久的数不尽的财富。然而当时清政府施行镇国政策，只在南方广州开了一个小窗口与他们打交道。殖民者倾销工业品的活动失败了，他们没能赚到他们想要的财富；可他们自己却又要不停地从清朝购买茶叶、丝绸等。贸易，这个在殖民地看来本来可以让他们赚钱的活动，现在却在让他们亏本。为改变这种局面，他们不顾清政府的禁令，把罪恶的鸦片贩卖到了中国，大肆向中国内地走私贩卖鸦片。很快，清朝国内上至高官下至百姓，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鸦片发出的毒气妖烟使清朝社会更加糜烂，殖民者却眉开眼笑了，他们拿到了一箱又一箱的白银。在白银大量流失，财政日益困难，军队战斗力降低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面前，清政府选择了禁烟。就这样林则徐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殖民者不甘心从此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依仗船坚炮利，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中国被迫签订屈辱和约，向他们打开国门。从那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就经常听到殖民者肆无忌惮掠夺财富，瓜分中国政治经济权益的吵嚷声。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时代大风暴未来之前，龚自珍，以他敏感的心灵感受到了惨变的来临，他再也无法按照长辈们的教导去做考据，去做通儒，去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官僚了，面对千疮百孔的社会现状，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写下了一篇篇批判专制腐朽、要求改造社会的文章，而他吟出的诗篇都满含着怒雷惊涛之音。在长长的黑夜里，龚自珍正试着点亮那盏用来寻找光明的灯。

少年时期的龚自珍生活十分丰富，私塾读书只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他还在治学的各个方面受到了良好的启蒙，学会了吟诗击剑，

结交了一批具有奇特性格的朋友，培育了他那歌泣无端、哀乐过人的雄奇性情。

母亲段驯虽是汉学家段玉裁之女，但她教育龚自珍却不是从考据经文开始时，而是让他学习古典诗文。六、七岁时，段氏就常在帐外灯前一句句教自珍读诗文，所教的不是《诗经》，而是清朝的吴伟业、方百川、宋大樽的诗文。吴诗婉丽，宋诗清新，方百川的文章则气势磅礴，龚自珍经母亲口授，很快就喜欢上这三家诗文。三家诗文明亮清新的风格、震动人心的气势深深感染着自珍幼小的心灵，在他的心灵深处埋藏下了这几家文字的神韵，此后作文吟诗往往不自觉地显示出来。

因为父亲在北京做官，7岁的龚自珍就随父母移居京师。8岁时龚丽正把家搬到下斜街，所住房子的院子里种有山桃花，春花烂漫时节，龚自珍就在花下背诵诗文。因为每天从私塾放学回来，父亲龚丽正都要抄《昭明文选》一篇让他背诵。

龚自珍10岁那年，京师周围因连日大雨，河水陡涨，冲决河堤，泛滥成灾。龚丽正就让人把自珍母子送回杭州。在杭州住了两年，每日仍由母亲段氏督促读书。少年龚自珍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很小的时候，每当斜阳西下，哀怨的箫声自远处传来，龚自珍就会痴痴地听，会不禁流下感伤的泪水，以后就爱上箫笛，自己也学着吹。这时龚家住在西湖边，有一个小亭在幽僻的六桥，龚自珍就常去那里，斜倚亭栏面对湖水，吹几支曲子。有一个春天的夜晚，他头上梳着两个发结，穿着淡黄色的衣衫，依栏吹笛，唱着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的《洞仙歌》词。幽幽的笛声，伴着自珍稚嫩的吟啸，在清冷的湖面上，随春夜微风一丝一缕的传出很远。多年以后，一位当年曾见此情景的人画了一幅《湖楼吹笛图》赠给自珍作为纪念，并写上了一首《水仙子》词。1813年，龚自珍13岁。龚丽正携妻子乘粮船赴京，住在横街全浙新馆。自珍被送到宋璠先生的私塾里读书，在那里主要学习四书、五经，练习对对子，学做八股文。

这时，外祖父段玉裁开始教龚自珍学习《说文解字》，学习文字学。乾嘉汉学讲究读书自识字始，《说文解字》正是文字学的基本入门书。以经说字，以字说经，在外祖父的指导下，龚自珍开始研究经学，同时学习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他14岁开始研究古今官制。16岁又开始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此留意于版本目录学。同时开始收罗书籍，个人藏书日渐丰富。17岁那年，父亲龚丽正带他参观太学，拜谒孔庙，指点他识读石鼓文，他又对金石学（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主要研究古代铜器和石刻）产生兴趣，为以后研究金石学埋下了伏笔。

由于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父母老师教授他的知识又比较广泛，龚自珍从小就遍读群书，经史子集都有所涉猎。偶然一次，他读到宋代著名改革家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立刻被王安石那慷慨激昂的文字打动了，从此爱不释卷，并曾9次手抄这篇文章。王安石忧国忧民之情感染了他，王安石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势所发出的改革呼声更时常在他的耳畔回响。从此，龚自珍就一直以王安石为榜样，大胆议论时政，主张改革变法，要求选报有用之才，革弊布新，富国富民。王安石的影响，使龚自珍的性格中增加了雄健高朗的一面，在他的诗文中，我们因此而经常看到高言快语，并感受到他雄健恣肆的文风的吸引力。

此外，龚自珍还爱读屈原、陶渊明，李白的诗，贾谊、诸葛亮、柳宗元

的文章，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注观博览，好学深思，使龚自珍成为一个博学多识的才子。

这时候，他的才华和志趣开始有所显露。13岁那年，塾师宋璠去参加科举考试，临去之前布置下来两篇作文，一篇《水仙花赋》，一篇《辨知觉》。龚自珍在所写的赋中称赞水仙花“一枝出沐，俊拔无双”，感叹它“端然如有恨，翩若自超尘”，并以水仙花自喻，寄托他不同于流俗的高洁情趣。在文章《辨知觉》中，他以寥寥二、三百字把知、觉二者的区别、联系言简意赅地点明，显示了他的才华。宋璠评阅两文，颇为称赏。

龚自珍自小所受教育不十分正统，而他又很顽皮，经常逃学。他极喜爱京师秋天高朗的景色，常私下从塾里逃出，溜进附近的法源寺里，四处转悠，或找一个雅静处自个儿悠哉悠哉地读书，觉得“春色满秋空，不受秋束缚”，快乐之极。当时他外祖父段玉裁的弟弟段玉立也住在北京龚家，他对小外孙龚自珍的学业十分关心，平常也爱与自珍在一起谈笑。听说自珍逃学，这位老态龙钟的叔公拄着拐杖，寻进寺内。龚自珍正在那儿玩得高兴，一个小和尚跑过来：“快跑，你叔公来找你了！”自珍一抬头见段玉立从石径上寻来，赶紧挟起书向旁边一片竹林里躲去。段玉立见他逃入竹林，他颤微微地追进来。他怎能追得到这个十几岁的小外孙呢，而自珍边躲边藏，偶而还回头逗叔公：“我在这里！”一老一小就这样在竹林中追逐穿梭，老人见怎样也抓不住淘气的小外孙，不由得也笑起来。寺内众僧聚在周围围观，见二人追逐穿梭，都笑起来，并说老人如一仙鹤，仙风道骨，小孩龚自珍则像一只顽皮的小猴子。

随着年龄大起来，龚自珍一天天变得成熟，开始交结一批朋友。18岁那年春天，他与浙江秀水人王昙相识了。王昙能写一手好诗文，擅长画画，而且极具江湖侠客风范，喜好谈论军事武术，常驾马纵横驰骋，引弓发箭，从不虚发，人称“慷慨悲歌，不可一世”，是一个有名的狂士。这时他已年届50，与龚自珍一见面交谈，发现二人极为投缘，遂成忘年交。王昙因怀才不遇，故诗文豪放奇肆，悲愤激越，龚自珍十分同情，也十分喜好他的诗文风格。与王昙交往，为龚自珍多愁善感的性情注入了另一种云游江湖的豪侠之气，他不久就学会了击剑，学会驾马如飞，在京郊与王昙一起纵马驰骋。所以龚自珍晚年回忆这段生活，写下了“少年哀艳杂雄奇”，“少年击剑更吹箫”，“少年奇气称才华”等诗句。

吟诗作赋，击剑吹箫，才华横溢，不拘成规的龚自珍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长大了，从此他即踏入社会，走上他那崎岖坎坷的人生之路。

二、箫心剑态

随着岁月的流逝，1810年，龚自珍已经19岁。多年来他一直跟随宋璠先生读书，按照那个时代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将走的道路，龚自珍必须进考场去博取功名，像古人说的那样，“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有获得科举头衔，才有可能参与社会政治事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治国安邦的才能，实现一生的抱负。现在，龚自珍到了该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了。

这年秋天，龚自珍第一次参加顺天乡试，中副榜贡生。这是龚自珍踏上他这一生追寻功名之路的开始，虽然不能说成功，但这些成绩也让全家高兴了好久。

龚丽正用书信把龚自珍中贡生的消息告诉了远在苏州的段玉裁，并请他在龚自珍名之外再起一字。段玉裁阅信后十分高兴，在回信里向龚自珍讲了许多勉励的话。至于起字问题，他认为字以表德，古人名与字互相呼应，龚自珍名自珍，那么字就叫爱吾吧。这是龚自珍第一个字，后来又屡经更改，先后有亦玉、璠人、伯定等，至于号则更多，定庵一号最为人所熟悉，故人们常称龚自珍叫龚定庵。

1812年春天，已考中贡生的龚自珍参加武英殿校录考9试，被选入充任，自此他开始研究校勘掌故之学。但刚任职不久，就赶上父亲龚丽正调任安徽徽州知府，加上龚自珍这时也要南赴苏州结婚，于是就辞去校录一职，随同父母从京师前往徽州。

到了徽州，略作安顿，龚自珍即陪同母亲一道赶赴苏州，去见外祖父段玉裁。在段氏桂园，已经垂垂老矣的一代名儒段玉裁看着眼前这个多年未见英俊潇洒、流满朝气的孙外孙，极为高兴。谈话间问及龚自珍这几年的学业，自珍便从怀中取出自己编就的诗文小集献上，段玉裁见他所写诗文甚多，内中有一二治经史的文章，一读之后，大为称赏。他说龚自珍写的文章“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慨”，又说自珍填的词“造意立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此事东涂西抹者多，到此者少也。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子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赞叹之余，他勉励自珍要在经史研究方面多下些功夫，继承发扬家学，作一代通儒名家，外祖父的这些嘱咐，自珍都一面听一面点头答应。

在苏州，由段玉裁主持，龚自珍与表妹段美贞结婚。段美贞是段玉裁的亲孙女，这两人成婚是亲上加亲，段玉裁打心眼里更喜欢这个孙女婿了。

婚后，龚自珍带着段美贞回到杭州。自少小离乡，至今已近10年。眼前西湖，水光潋滟，柳枝摇曳，花香沁人心脾，伴着娇妻，泛舟湖上，龚自珍回想这几年在京师的所见所为，不由十分感慨。他一方面感叹自己年轻，没有功名地位，满腹才华还无人赏识，为此他曾写下了“一朵孤花，墙角明如许！莫怨无人来折取，花开不合阳春暮，”这样的诗句，另一方面他又充满信心，相信自己在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会有机会一展才华，报效国家。这万千心绪，翻涌心中，龚自珍都把它们融铸为《湘月》这阕词：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天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

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此词一出，迅速流传开来，大加称赏的人很多。在词中，龚自珍渺视那

用八股文取得的功名，认为这并非人应该做的大事，他还怀有经世救国济苍生的宏大抱负，可是又有几个人能理解呢？于是他只有“怨去吹箫，狂来说剑”，在箫声剑影中求得解脱。洪子骏读此词后，填《金缕曲》词赠自珍，词中有句“侠骨幽情箫与剑，何箫心剑态谁能画？”10年后，吴文征终于受此词意启发，画了一幅《箫心剑态图》送与龚自珍作纪念。

在龚自珍笔下，箫与剑成为文武两种才能和他内心失意与激愤两种情绪的象征。剑象征着他的报国雄心，“说剑”正是他指点江山，发表自己治国政见的意见。箫象征他忧国忧民的幽怨之情，“吹箫”正是他人生失意却又对民生国事忧心如焚时的一种表现。“怨去吹箫，狂来说剑”正是青年龚自珍生活历程的一个最恰当的象征和说明。

在杭州住了几个月，当年夏天，龚自珍携妻来到徽州父亲的住所。

第二年春（1823年），龚自珍23岁，他再度入京去参加顺天乡试，虽然上一年他曾对此表示过不屑之意，但为人世，为家人，他还只得一次次去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是农历癸酉年，按照惯例，每逢子、午、卯、酉年春天，朝廷都将在京城及各省城举行乡试，中者即为举人。龚自珍这一次没有成功，考场失意使他郁郁不乐，常借诗词来抒发他有才而不得志的幽怨之情。在京师逗留了4个月，八月他才离京回徽州。出都路上，见旅店墙上有“一骑南飞”4字，不由感慨万千，填木叶词数首，一时和者甚多。又填《金缕曲》一阙：

我又南行矣？笑今年鸾飘凤泊，情怀何似？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暮雨忽来鸿雁杳，莽关山一派秋声里。催客去，去如水。

年华心绪从头理。也何聊看潮走马，广陵吴市？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来岁长安春事早，劝杏花断莫相思死。木叶怨，罢论起。

词中既抒发了他考场失意的郁闷幽怨之情，感叹自己才华虽有却无人赏识，而且文章写得再好，言论发得再高远，能够惊动海内，可于世事又有什么相干呢？它并不能真正干预现实，改变社会，革弊布新，富国强兵，所以仍不过是“纸上苍生而已。”因为这，他想还不如像江湖侠子一般云游江湖，啸傲山林，结交美人知音。同时在词中他又表达了矛盾的心情，他毕竟还没有失望到绝尘离世，还怀有希望，认为今后会找到机会来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的，所以不愿断了取功名的念头，决定明年再来，再现身手。

怀着这种情绪，经过一个月的跋涉，9月，龚自珍回到徽州。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考场失意，倒也没有什么，可就在这几个月里，他刚结婚一年的娇妻撒手离他而去了。原来段美贞婚后有病，身体不适，请来的医生是个庸医，竟误诊为有了身孕，结果误了治疗时间，待到发觉不是怀孕而是得病，为时已晚，终于不治去世。爱妻的去世，使龚自珍悲痛万分，回想婚后他们在一起所度过的美好时光，孤独、哀怨，一切的失意徬徨都加重起来。考试不顺，又痛失娇妻，龚自珍情绪消沉，只有借幽怨的箫声来打发他清冷的人生了。

就在这时从京师传来天理教首领林清等人攻打紫禁城的消息，一时传言四起。不久嘉庆皇帝向天下颁发了《罪己诏》及一系列谕旨，他一面惊呼这次突发的起义是骇人听闻的，一面又感叹，说自己治国一向以爱民为本，从不作扰民害民的事，而这次起义又说明民怨沸腾，这都在于群臣未能贯彻自

己的治国宗旨，昏愚恶劣，以致激起民怨，导致天理教教首林清率人从教徒攻打皇城。

而对这样的形势，又看到嘉庆皇发布的诏书和谕旨，龚自珍再也忍不住要加以评说了，他一连写下了4篇《明良论》。他跟中国古代的其他儒生一样，认为上古三代都是盛世，一切事物都上正轨，当时国泰民安，君明臣贤，而今日则不同，民怨甚重，贪浊之吏很多，国家忧患丛生。那么原因何在，出路在何方？

首先，龚自珍主要谈群臣的生活状况与国家治理好坏的关系。他针对嘉庆皇帝批评今日大臣只顾私利，不念国家这一意见而发。他说三代以上臣僚并无求富之事，也不耻言求富之事。他们生活富足本是天经地义的，不是承君主的恩赐而得的，而是他们应得的，所以不必向君主感恩戴德。而今日君主则以为大臣不应当求富，并向君臣屡申此意。龚自珍则认为这很不通。他引经据典，论证先贤圣哲都说大臣当富不当穷，并指出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这用于士大夫自律则可，若君主用它来要求大臣则不对。古代的士大夫因为富足，所以畅论国事，急公爱上，志在报国，或者优游书画之林，文采风雅。今日的士大夫则为每天的生活支出所困扰，饥寒穷迫，债主不时上门催债，斯文扫地，豪气全消，他们哪里还会有心情会谈国事，商论时政呢，整日所想所谈的只能是些生活琐事罢了，国家当然是越来越治理不好。由此，龚自珍提出要改善大臣们的生活状况，使他们生活无后顾之忧，尔后他们才能够一心一意为国家办事，也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忠心报国，与君主一道把国家治理好。

其次，龚自珍辨明今日士大夫的廉耻问题及其改革方向。他说士不知耻，这是整个国家最大的耻。纵观今日那些做官的人，从科举考试中一开始，心中的羞耻观念已经没有一点，当官愈久，名位越高，人品就越萎琐，而对溜须拍马的功夫却越来越精。因此三公六卿当中很难见到古代大臣巍巍岸然的风貌。为什么会这样呢？龚自珍认为责任在于君王。他引汉代著名的政治家贾谊的话说：君王对待大臣如果像对待犬马一样，那么大臣们就会以犬马自居；如果像对官徒一样，大臣们便会以官徒自居。古代君王待大臣以殊礼，相与讲道谈论，从不用训斥奴仆那样的语气来和大臣们说话，也从不用要求奴仆的礼节来要求大臣们，故大臣中博学宏儒不断出现。今日君王早晚见大臣就让他们长跪不起，君王高高在上训斥责骂他们，日久天长，他们哪里还有廉耻之心。而无耻之人，位低官小则害己害家，位益高，官越大，为害就越大，大官则危害国家。今日的政要只会写写字，做几首诗，别的再不闻问，民生疾苦似与他们无关。在朝堂上发言，全看皇帝的脸色行事，以投皇帝所好，好保住官位，往上升迁。他们追逐犬马，浑然忘记了自己身上还有治国的重任。说到这里，针对嘉庆皇帝上谕中引勾践卧薪尝胆之事自况，龚自珍认为既有此决心，就应该让大臣具有廉耻之心，君王则待之以礼，这样下去，大臣们就一定会忠心报国，而国家也将会日益繁荣富强。

在第三论中，龚自珍主要讨论国家用人问题。他把攻击矛头对准官员升转的规定“停年格”（以做官年月长短为据）。他细算了一下，一个读书人从参加科举考试，到取得进士头衔，一般年龄已有20至40岁，可以30岁为计算标准。中进士后入翰林院，再从庶吉士一级级向上升，待做到各部尚书，大约要花30至35年，到大学士还要近10年时间。不论怎样，从中进士到做一品官，少说要30年时间。如此一来，高官们都已经六七十岁，他们已经成

了只顾私利，不顾国家，昏庸没有生气的人。意气风发的少年英才却因做官年数少而不能尽快让他们担负起治国安邦的大任。又因为有“停年格”，所以做官的人不论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安心等着升官，不会尽心尽力地为 15 国为民办事。现在人们看到为国家办事，急公忘私，志在报国的人几乎没有，就是因为“停年格”阻挠了人才选拔和任用，而保护了那些尸位素餐的庸碌之辈，改革这一规定势在必行。

写罢三论，意犹未尽，龚自珍又在四论中提出了变法的主张。他把此时的清王朝比喻成一个全身长满疥癣的病人，明知要治病，却又不知道怎么治。没有办法，就把自己缠在一根木头上，捆住手脚，让全身和四脚不能活动，然后任其疼痛。现在清王朝的统治已危险至此，有识之士再也不能束手不动。他认为过去大臣办事不力，主要原因在于束缚太多。千百律令，那原本是用来束缚吏胥的，可今日却用来束缚大臣。要改变清朝现在这样一副满目疮痍的破败面目，君主必须放手让群臣去做，只审查百官治国的效绩，不必去考校百官治国的方法方式，嘉庆帝既然有意于千载一时之治，那就该“删弃文法，捐除科条，裁损吏议”，自己掌总治国大纲，让群臣尽心去做。

《明良论》四篇表现了龚自珍关心时政、忧国忧民之情，文章指斥论说，淋漓酣畅，很富有感染力。但是一个科场不顺的年青人，他提出的变法改革主张谁来听呢？而且，这议论中也有许多看法不符合历史，有些主张根本不可能实现。此后几年里，龚自珍在塾论《乙丙之际著议》这一系列 20 余篇短论中，继续批评时政，提出改革设想，对他在《明良论》中提出的变法主张作了进一步的深化。

继段美贞去世后，家人就在为龚自珍续弦问题上费心。1815 年，龚自珍 24 岁，他在杭州续娶浙江山阴人何吉云为妻，何氏也出身名门，能吟诗作文，与龚自珍很相得。

1816 年，龚丽正升任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安察史，龚自珍携妻赴上海看望父母。从这以后，龚自珍又开始了一段天南地北奔走的颠沛生活。

三、考试·治学·论政

1816年秋，龚自珍到杭州第三次参加省试，未能考中，回到上海。此时他父亲龚丽正门下聚集了不少文人学士，龚自珍与钮树玉、何元惕、袁琴南、李锐等在一起谈诗说艺，切磋交流，商讨国事，发表政见，因此学业、思想日有进步。

第二年，龚自珍收集历年所作诗文，自觉有些成绩，但又感到仍有不足。于是他将诗文送给王芑孙，向他请教。王氏是当时一著名诗人、书法家，素受龚自珍的敬慕。本来龚自珍想听一些批评和鼓励性的意见，不料收到回信，一读之下却大失所望。王芑孙在复信中说今日国家昌盛，怎么龚自珍竟说破败不堪。又批评龚自珍的诗文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到处都是，甚至上及国家朝廷，下及士子名流。他警告龚自珍，说话不加注意，随便批评他人，就会与世人发生冲突，这样一来便会受到他人排挤，遭到压制，最终老死荒江老屋之中，既无功名，更无事业，无人问津。他奉劝龚自珍修身慎言，读书力行，取功名，作大官，为盛朝作些有益之事。看罢来信，龚自珍大为感慨，今日时局已破败如此，而那些迂腐的儒生还说国家昌盛，为了一己私利和名位苦苦钻营，却不敢大声疾呼改革振兴，实在令人失望。从这以后，他不再去理会那个王芑孙了。

1818年，龚自珍27岁。这一年嘉庆帝60大寿。按清朝科举制度，除每3年开考一次外，遇庆典还可以加开，称“恩科。”故今年又开恩科，龚自珍再次赶入杭州，第四次参加省试，这一次他名列第四，中了举人。座师为王引之、李浴堂。王引之是著名的乾嘉考据学大师。龚自珍考中举人的消息传来，龚家上下高兴欢庆了好一阵子。

龚自珍中举后，功名心大增。他拿着逐年写作的八股字2000多篇去见父亲的一位同年进士，请其指点，那人看后，称赞龚自珍有才华，文章写得好，但又告诫他，写八股文只要阐述经书之意即可，不要发表个人见解，更不能随便发惊世骇俗的议论。听罢，龚自珍失望了，只是抄抄经书，重复那些所谓圣贤说过的话，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这要求龚自珍怎做得到？所以一回家，龚自珍就将2000篇八股文习作付之一炬。

转眼一年又过去了。2月，龚自珍从上海动身前往北京，第一次参加会试，没有考中。他并没有立刻打点行装，离京返乡，而是留在京师，暂住于丞相胡同，跟随当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刘逢禄字申受，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治公羊春秋传，信服董仲舒、何林等人的学说，讲求经文中的微言大义，阐发三世、三统及托古改制的思想，主张经世致用，干预时政，进行变革。龚自珍与刘逢禄相识，听其一番高论，倾心佩服至极，遂决定跟着他好好学一学。

在北京，龚自珍结识了比他小两岁的湖南学者魏源。魏源也是晚清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革新家，与龚自珍一样，他也主张经世致用，变革变法。由于二人思想上有许多共通之处，故二人一见如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以后的日子一直保持交往，相互切磋，共议时政。时人遂因此将二人合称作“龚魏”。

这时，龚自珍还拜会了王念孙老人。王念孙，江苏高邮人。著名训诂学家，是龚自珍中举人的座师王引之的父亲。他与自珍的外祖父段玉裁都共同受学于安徽戴震门下，在经学上属于古文经派。他们治学态度严谨，强调论

证有据，言之有物，思想也不保守，门户之见不深。龚自珍与王氏的交往，以及外祖父段玉裁的教导，都对他的治学路向有一定影响，在经学上形成了他今古文兼收并蓄，不主一家，主求变通的特色。

在北京周游了半年，到秋天，龚自珍离都回到上海。陪着父母度过 1820 年的春节，他立刻动身赴北京参加会试。3 月参加考试，再次落第。4 月，以举人身份被选为内阁中书。但考场失意后心情郁闷不乐的龚自珍没有接受这一职位，而出京回到了上海。

1821 年春，龚自珍再度入京，捐资就任内阁中书，参加国史馆修订《清一统志》的工作，任校对官。很快他发现重修的志书中错误百出，部落名、地名误漏之处很多，为此他上书总裁，文章论西北塞外部落源流、世系、风俗习惯、山川形势，并订正旧志疏漏错误 18 处。因为这些并不属于他工作的职权范围内的事，别人劝他不要管闲事，越权上书，并无好处，最后他只好删减文章，举其大要上之，但上司们根本就不重视他的意见。龚自珍感到很气馁。

这时他又上书觉罗宝兴。原来上一年新疆发生了叛乱，民族上层分裂分子张格尔在英国殖民者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支 19 判军，由浩军率领，侵入新疆，在南疆发动了叛乱。消息很快被送到京师，并很快在百官士子们中间流传开来，龚自珍注意到这一点，极为关注。当时他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写下了《西域置行省议》这篇文章。

就在本年自珍入京前，他听说他早年乡试的房考大人觉罗宝兴被朝廷任命为新疆吐鲁番领队大臣，因而入京之后，以师生之谊，连夜作书，上书觉罗宝兴陈述自己关于治理新疆问题的意见，并附上近年《西域置行省议》，期望自己的意见得到重视，能被采纳。

在上书中，龚自珍介绍了西北地理的概况，回顾了入清以来所发生的几次叛乱和朝廷的平叛情况，认为民族压迫政策是导致新疆不安定、叛乱屡起的主要原因。由此，他向觉罗大人建议，入疆之后应当采取尊重民族的政策，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西北地区的安定。

《西域置行省议》则更是历史上一篇极为重要的论著。它是龚自珍多年从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结晶。在这篇文章中，龚自珍条分缕析，指陈画计，认为只有开发新疆才是巩固西北边疆的一条久固之策。他的具体建议分两点，一是强调置省。他认为整个西域可以分成 4 个州、10 个府、44 个县和 3 个直隶州，朝廷可在这些地方自上而下分别设置总督、巡抚、布改使、按察使、巡道、提督、总兵官、知府、知直隶州、知州、知县等官职，建立起一整强有力的有效的统治机构，从而有效地维护中央对新疆的控制。文章并详细地罗列了各州县的名称及其所应管辖的地域，实际上是为西域设省画出了一份极为详细可行的蓝图。

文章的第二个建议是“移民”。他认为当时中国内地人口经过多年增长已经过剩，地少人多，土地所出，不敷消费，朝廷的加税收捐仅是权宜之计，并非久远之策。真正要做的是如何妥善有效地安排这样一大批过剩的人口。他认为西域可以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条件。即将内地这些过剩的人口招募起来，移往西北，政府给与一定的安排，发给他们耕牛、农具、种子，分给他们一定的土地，组织他们垦荒耕种。朝廷可以规定几年内免收赋税，同时在若干年内不许内地向这里输入奇技淫巧之物，不许对其地进行财物的掠夺，一方面厚其民风，另一方面使这一带富裕起来，这样一来，不用多少年，即

可以使西北地区富足起来，又可以解决内地人口过剩问题，最主要的一点是通过开发西域，加强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巩固边疆，杜绝外国殖民者侵占我国西北地区的念头。

龚自珍的移民实边、足食足兵和以边安边主张，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开发西北，巩固西北边防也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书上给了觉罗宝兴，过了几天，觉罗宝兴起身赴西域，龚自珍前去送行，他很想听听这位大人的意见，然而觉罗根本就不提此事，他似乎早忘了龚自珍的建议。龚自珍的意见没有被重视，更没有被实行，他的先见之明几乎没人认识到它的价值所在，龚自珍愤慨至极，他后来在诗中写道：

文章合有老波澜，
莫作鄱阴夹漈看。
五十年中言定验，
苍茫六合此微官。

他说自己这一番苦心无人懂，可是不用多少年自己的话一定会应验。果然，50年以后沙皇俄国就一步步地吞食新疆，先后掠夺了我国的大片土地。直到这时清政府才在这里设巡抚，设立行省。而龚自珍50年前所发这番议论才得到人们的重视。至于移民开发西北，则更要等到龚自珍写这篇文章的100多年以后才真正得已实现。

11月，龚自珍治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的地理学又有新的进展。他上《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撰《蒙古图志》。这是他沿龚清中叶以来学者治西北史地之风所作的又一项重要研究工作。全书拟分30篇，18表，12志，并附图28幅。此书仅完成十之五六，因第二年家中书楼失火，原稿和他所搜集的大批资料随火化为灰烬，故全书没有完成，只留下了一些片断文章。大约同时，他还对沙俄入侵中国东北和康熙皇帝抗击沙俄，最后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一事发生兴趣，写下了《最录〈平定罗刹方略〉》一文，提请统治者及有识之士注意巩固边防，注意外来的政治威胁。

1822年，31岁的龚自珍第三次参加会试落第。失意愤闷之余，他写下了《拟厘正五事书》，就整理文献和教育问题提了5条意见，在论及科举制这一条中，他猛烈抨击八股文，认为这种以四书五经注疏为标准答案的八股文，并不能测出也不可能测出一个人的真才实学，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为国家选拔有用的人才，只能让读书人疲精劳神耗费光阴于无用之学中而已。他认为必须改革，提出用讽书射策的古代考试办法来代替八股文。

这年冬天，龚家不慎失火，大火将书楼烧得几乎一干二净。1个月后，在北京的龚自珍闻听此事，遂以省亲为名南下探家，京师诸友听说他在这个时候回乡，都劝他不要回去，以免影响功名前程，自珍置之不理。回到家中，看到家里的5万多卷藏书已成一堆灰烬，他费时多年才搜集到的大批金石碑版和书籍资料丧失大半，已经成稿的一些著作也被烧掉，随之而丧的还有他一直想作的金石碑版目录方面的学问，面对此景，一时间龚自珍心中生起了万念俱灰的悲戚之情，惆怅良久。

第二年他仍旧回京担任内阁中书。不久第四次参加会试落第。与诸友交往，常感叹清朝人才凋落，各种政策又都压抑人才，为此感到十分痛苦，同时又有一种不甘与俗世同浮沉的孤寂清冷，这更激起他要讥议时政、倡言改革变法的情绪。

不久，自珍母亲段驯去世。龚自珍解职回乡奔丧，安排完母亲丧葬诸事，

即在家中守丧。

守丧期间，他颇有意于重整金石之学。他认为研究金石不能不讲古器款识，这是谈文字学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石刻文字资料作为史传的外编，可补史传之缺误。他一直想编一本《金石通考》因前番家中失火，烧去他多年搜集的资料，以致始终写不成，只能写一些零篇文章。

这时，他还专心研究佛学。他与江沅、贝墉共同校刻唐代佛教学者宗密的《圆觉经略疏》。此间他还交结了一批学佛的朋友，大家共同谈经论佛。佛教自此对龚自珍的思想影响日益扩大。它一方面安慰了失意下龚自珍苦闷的心灵，同时也使龚自珍情绪更趋徬徨消沉。

1825年10月，守丧期满。龚自珍又开始写文章。这一年他写下了《古史钩沉论》7000言。这是一组借谈论历史而议论时政的文章，文章评击历来统治者残害天下人才的罪行，攻击一人在上、万民下伏，一人为刚、万皆柔夫的专制主义制度，并指出清王朝看来气数已尽，故不再有圣人出世，由此他认定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才能挽救衰亡中的社会国家。

就在这一年，龚自珍写下了那首读之沉痛的《咏史》诗：

金粉东南十五州，
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
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
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今安在，
难道归来尽封侯。

在诗中他抨击现在的统治者尽是一些庸碌无聊之辈，高压的统治使知识分子不敢议论时政，将这些人都拉进了功名利禄之中，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哪里还有希望。他呼唤像汉代田横那样有气节有勇气的勇士出现，不要让这些今日还存在的侠义之士都磨掉了勇气，被功名利禄所骗。

四、写诗与戒诗

龚自珍是晚清诗坛的一位大家，其诗雄奇恣肆，声调激越，犹若滚石落珠，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近代许多诗人都曾受到他的诗风的影响。在他的全集中收有六七百首诗，其中有不少已成为人们平常屡加称引的名诗。但就在他的诗歌创作生涯中，他曾经两次戒诗，而戒诗前后，又往往有大量诗作涌现。所以写诗与戒诗就成为后来人们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第一次戒诗在龚自珍 29 岁那年，岁属庚辰，故可称“庚辰之戒”。第二次戒诗在自珍 36 岁那年，岁属丁亥，可称“丁亥之戒”。前一次戒诗为时约一年，后来破戒。第二次戒诗则历时三年之久，直到 39 岁那年才又偶尔写诗，一直到他晚年辞官归乡，才再次诗情喷涌，写出了长达 315 首诗的大型组诗《乙亥杂诗》。

1819 年，自珍 28 岁，他入京参加会试。初到京师，他四处游历，拜访长辈、朋友，情绪很高，诗兴也好。这年夏天，他游北海，过玉蜓桥。但见桥下的北海和中海，万顷碧波，一片片绿荷迎风摇曳，湖光荷影，意境辽远。自珍面对这番美丽的景色，兴致勃发，立马桥上，口占一绝：

荷叶粘天玉蜓桥，
万重金碧影如潮。
功成倘赐移家住，
何以湖山理故箫。

虽然这时他考场上并不得意，宏大的抱负也还没有机会施展，但他的雄心壮志仍在，他坚信自己会有功成名就的一天。面对北京这般佳景，他喜爱至极，能够住在这里，又能施展才华，何必要回到故乡借箫笛打发自己失意的幽怨呢？

情绪有高昂时，就会有低沉时。高兴时吟诗，忧愤时也要作诗。这年夏天，他游北京陶然亭，面对暮气沉沉的现实社会，深感前途阴冷不定，一种忧国忧民之情不由顿生心中，遂题诗壁上：

楼阁参差未上灯，
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
忽忽中原暮霭生。

写诗，成为龚自珍表达个人感情的一个手段，正是在这一次感情的沉郁喷发中，他留下了不少佳作。然后，29 岁这一年秋天，他突然向朋友们宣布，他要戒诗，为此，他写下了《戒诗五章》自称“戒诗当有诗，如偈亦如偈”。

为什么要戒诗呢？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了专心致志研究经世致用之学。这一时期，他忧国忧民之情常溢于言表，常想为治国安邦一展自己的才华，但是诗情常来，一发则如泉涌，扰得他心绪不宁，精力分散，使他不能专心研究学问。所以他起了戒诗念头，想通过戒诗，改变自己歌泣无端的性格，让自己更理性地考虑问题，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考取功名，发挥经世才华方面去。二是为了避祸。因为他在诗中往往放言无忌，批评时政，受到不少权贵的忌恨，使得龚自珍常感到受他人的压制，为减少这方面的麻烦，他决定还是不写诗为妙。三是为了学佛。龚自珍早年就对佛学发生兴趣，而佛教教人清心净心，不生杂念，勿悲喜过度，可龚自珍写诗，常哀艳幽怨，情绪一会云上九霄，一会跌入深渊，这对学佛可是大忌。当他决定向江沅学

佛时，他也就决定戒诗了。

戒诗宣言一发，他真的把勃勃诗兴扼住了，朋友聚会，再不吟诗，人们都称道他有佛根。过了一年，30岁这一年他参军机处章京，结果未被录取。壮志受挫，又想起军机处内部那般黑暗，不由得愤恨不已。情绪上来，忘了诗戒，一连写了《小游仙词》15首。这戒一破，就一发而不可收，他的诗作又滚滚而出。以后的7年里陆续写下了200多篇诗，各种形式的都有，涉及的事物十分广泛。后来曾选出其中部分，结集为《破戒草》。

第二次戒诗在1827年，与庚辰之戒相隔7年。这一次他确是没了诗情。

龚自珍戒诗前夕恰是处在人到中年万事不顺的时期。他27岁中举，28岁第一次参加会试，近10年间他先后5次参加会试，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第五次会试，刘逢禄先生竭力保荐，结果仍不被录取。龚自珍怀抱壮志，等了这么多年，却始终无人赏识，才华也得不到施展。考场失意的郁闷使他意志消沉，十分悲观。在这些年里，他所提到的多次改革建议，往往是随书奉上，随即泥牛入海，没有回音，一项项耗费心血草拟的改革计划付之东流，怎能不让他失望？由此他对现实越来越不满，对清王朝的腐败没落也越看越清，可他又找不到出路，悲观失望，再加上前途渺茫，他只有束手静坐，哪里还有写诗吟唱的热情？另外，家庭的变故也对他有很大打击。家里书楼因火而毁，使他在治学路上受到重大打击，已成书稿许多已不复存在，想要写的文章和书却因资料被烧而再也无法动手。这一时期，从小到大一直关心爱护他的母亲去世了，随后父亲又退官回乡。这一系列变故都使龚自珍十分痛苦，思之常泪流满面。物是人非事事休，心境灰冷，情绪消沉，没了诗情，他不戒诗也写不出好的诗了。

这年秋后，他再次宣布戒诗。此后一面在京师做他那个清闲的小官，一面钻研考据，研究金石学，想通过这些枯燥的学术研究活动来消磨掉自己性格中雄奇成分，把自己的这份让很多人忌恨的才华耗掉、磨掉，让自己变得没有锐气，没有朝气，变得与俗世诸人一样。同时他化了不少精力去研究佛学。为此他在诗文中曾说自己“借琐耗奇，嗜好托兮”。又表示“今年真戒诗，才尽何伤乎？”他有时竟消沉得想让自己才华丧尽，成一常人。

丁亥诗戒坚持整整3年，他虽经常参加宴游聚会，也经常迎来送往，但从来不写一句诗。甚至他考中进士，合家十分高兴，他也不写一句诗以志之。一直到他39岁那年，他才又偶尔写诗，但多数是些游山玩水和应酬之作，他诗中常见的悲愤激越的风格很少再现，偶尔一显，也是灵光一闪，随即湮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48岁他辞官回乡，他才再次诗情喷涌，写下了佳作叠出的《乙亥杂诗》，在他的诗歌创作史上突起了一座高峰。

五、京师十四年

1826年，龚自珍35岁，自入官京师以来，他一直未带眷属，因为父母在南方，他每年冬天都要赶回南方陪父母过年。到这时，母亲丧满，自珍遂携妻挈子，举家迁入北京。从此以后一共14年，他一直住在北京，没再回南方。后来龚自珍写诗回忆这一段生活：

小别湖山劫外天，
生还如证第三禅。
台宗悟后无来去，
人道苍茫十四年。

在京师的苍茫14年里，龚自珍的生活是各种各样的滋味交织在一起的：挫折、失意，交友、结社，治学、议政，他变得越来越深沉，而名声也就越来越大。

入京的这年3月，他第五次参加会试。主考分校之一是刘逢禄，一直很赏识自珍的才华，常为朝廷不取这样的人才而发感叹。这一次刘氏见浙江、湖南试卷中有两份经策高深奥博，料想便是龚自珍和魏源的，于是他竭力向阅卷诸公推荐，但没有被接受，龚自珍再次落第。为此事，刘逢禄感叹了很久，并写下《题浙江湖南遗卷》诗，表示惋惜之情。

又过了两年，龚自珍38岁，他第六次参加会试。因为屡考屡败，龚自珍对考试成功不抱多少希望，更何况上一次经过刘逢禄大力荐举仍不能被录取，所以这一次他纯是为了慰藉家人而来参加的。然而这一次他竟然考中了，中第95名。

按科举考试的规定，会试之后，中第的人还要参加殿试、朝考。这两场考试都由皇帝亲自出题、亲自监者，所考内容都涉及当代政治经济军事的重大问题，通过考察中第的士子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主张，来评定等级。龚自珍中第后，心情舒畅了许多，进取心也大增，为考试他做了不少准备，并很想借此机会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治国安邦主张，一展压抑多年的才华，如得到皇帝的赏识，便将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报国志愿。

4月2日，龚自珍去参加殿试。在对策中，他仿照宋代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精神，总结自己多年来的政治主张，从政治措施、治理黄河、选报人才、巩固边防诸方面提出了改革性的建议。文章一开始他写道：不研究经学，不会懂得经术是事物的本源；不探讨历史，就不知道史事可以作为借鉴；不通晓当世事务，就不会知道前人在经史中提出的主张在今天实施起来哪些要缓行，哪些须急行，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他认为时势在变化，制定政策应当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不必拘泥于经史。为此，他提出了以下建议：

首先应注意官吏的任命，必须选拔优秀的人担任地方官，皇帝应充分尊重他们，以礼待之，放手让他们治理地方。

其次必须加强农业生产。他举汉代历史为证，认为农业发达则会民风淳厚，风俗淳厚则会臣忠国安。对于现在东南数量庞大的游民，则可组织他们开垦西北的旷土，从而一举解决游民与开发西北两大问题。

关于河患问题，他认为主要有疏、防两个办法。疏即清理河道，导流入海；防则是整治堤堰，并根据黄河上、中、下游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

关于人才问题，他认为今日国家要想选拔真正的人才，教之用之的办法

不能不加以改革，过去那种让士子耗精劳神于无用之学，进身之后又让他们做所不熟悉的钱谷兵刑之事，学与用互相分割，事情当然办不好。所以必须改革科举制度。

最后关于边防问题，龚自珍针对清政府在西域的统治问题，提出对症下药，采取多种不同措施，不要泥古才能巩固边防。

考完对策之后，龚自珍又参加了朝考。这次皇帝出《安边绥远》为题。面对试题，龚自珍十分感慨。其实他心中早有主张，多年前他曾上书觉罗宝兴，随书附上他写的《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但当时没有引起重视。这一次考试他再次有机会陈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精辟见解。于是他根据张格尔叛乱刚刚平定，朝廷上下正讨论边疆问题这一背景，先分析天山南北的历史，介绍了历代安边的主要方法，然后叙述现在西北地区的情况，提出要安治西北，只有采取“以边安边”的政策。具体做法便是足食足兵。天山南路水源丰富，土地肥沃，可以开垦种稻，当然不采取过去的屯田办法，而是把这些土地作为私田，让当地老百姓和戍卒占地而耕之，不用几年当地粮食就会很充足。在政策上同时禁止把当地物产运入关内，以使其地钱裕物丰；禁止内地的倡优淫巧出关进入南疆，以厚当地民风，使当地人民生活纯朴，不会奢侈。南路足食，北路则责之足兵，让北路伊犁将军专心训练军队，增强军队战斗力，而让南路供应粮草。南北路一足食一足兵，互相制约而又不用烦扰内地，中央在西北的统治自会稳固，西北边防问题也就可以一举解决。

洋洋千言，写完后再审视一遍，自珍便掷笔出场，等待消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霜毫掷罢依天塞，
任作淋漓淡墨看。
何敢自矜医国手，
药方只贩古时丹。

他自认为自己为治理国家所开出的“药方”只是活用古代的思想而已，当然他以为都是可行而又切合实际的。他的这些以古为鉴而发的政治言论使阅卷诸人看完都十分称叹，但是又以龚自珍写的字不好，没有达到朝廷要的“馆阁体”标准，遂以楷法不中程为由不把龚自珍列入优等，于是自珍只得了个三甲第十九名，授进士出身，龚自珍因此进不了他一直想进的翰林院。朝廷任命龚自珍去做知县。愤愤不平之中的他没有接受，仍请求留任内阁中书。

年届40，仍然只做一个小小的中书舍人，又是闲职，龚自珍自感一腔报国之情无处发，许多治国安邦的主张不能实现，而他又人微官轻，说出来也无人听取，所以思想与情绪变得更加沉郁。

中书舍人这个小官又做了几年，他被升为宗人府主事。46岁时改官礼部主客司主事。后来在朝廷一次考察中他的任官成绩被评为一等，于是又升他去做湖北同知。他没有就任，仍任职礼部。他在这个官位子上一直做到他辞官回乡为止。

龚自珍因为所谓楷法不中程而未能进入翰林院，做不了翰林也就没有机会出任封疆大吏，也不能升任宰辅长官，只能长期做清闲的小官。在小官位子上又时常遭到他人压制排挤，生活很不顺利，情绪也就趋于消沉偏激。所以他在家让自已的女儿、媳妇、小妾和婢女都去学写“馆阁体”，向外便对人说：“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一是嘲笑当今取人只看字不看才，

二也是发泄他未能入翰林院的愤慨之情。

在京师的这些年里，他投入不少精力研究文学、史学、经学、小学、金石家以及佛学。

在经学方面，1828年他写成《尚书序大义》，《太誓答问》等文章，讨论尚书篇目、书序问题，流传问题以及汉代今古文问题，涉及面很广。1833年他著文讨论《春秋左传》，认为《左传》经过汉代刘歆的篡改。对六经问题，他同意古文经派的说法，认为孔子之前已有六经，同时反对尊《论语》、《孝经》为经，批评这种做法是在混淆视听。1838年他又写成《春秋决事比》六卷，于《春秋》、《左传》、《公羊》、《谷梁》，折衷去取，广征博引，加以评说。

在文学方面，1828年他研究李白诗作的真伪问题，经过考证定出李白真诗122篇，并指出李白诗风实继承庄子、屈原而将二人融合于一体。

在金石学方面他用功更多。1827年写成《羽琖山馆金石墨本记》。后来又完成多篇考释金石铜器铭文的文章。他还收藏了众多种类的铜器，数千种碑帖。受乾嘉汉学影响，他搜罗金石文字主要是为了证史，为学术研究提供旁证。曾用它补证《说文解字》，还运用金石文字论证过秦汉魏晋的史事。

至于佛学，龚自珍研究已有多多年。在京师生活不得意，情绪消沉，遂常借佛学研究来平复郁闷的心情。1837年，他重订《妙法莲花经》的篇目次序，并加删节，又撰写订正佛经翻译错误的文章，写了多篇阐释佛理的文字。

在京师，龚自珍的另外一项重要活动是交游。他利用各种机会，游历了京郊的各个地方，并对北方的风土地理作了不少考察。在此期间，通过聚会交谈，他结识了一大批朋友。

他与朋友交游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因赏花、有因会友、有因迎送、还有因同乡同年而聚会；所交朋友也是三教九流不拘，有知心朋友、诗友、穷友，甚至还有一些在一起饮酒谈心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

花之寺，原名三官庙，在丰宜门外（今北京右安门外），寺内栽种有各色海棠，佳品甚多。每当春天海棠花开，此地便游人如潮，十分热闹，京师的士大夫们也常在此置酒聚会，赏花吟诗。这里是龚自珍在京师生活的14年里与朋友们聚会次数最多的一处。前后共有4次：

1827年暮春，龚自珍与金应城、汪潭等人以赏花为名在花之寺第一次聚会。

1830年4月，由徐宝善、黄爵滋发起，龚自珍、魏源、汤鹏、潘德舆等14人第二次在花之寺聚会。此时已为暮春，海棠花已谢，虽以赏花为名，实际上看到的已是落英缤纷的景象。

1832年春，由龚自珍作召集人，魏源、宋翔凤、包世臣等十四、五人在花之寺第三次聚会。

1836年，由徐宝善召集，龚自珍等同朝名士18人在花之寺第四次聚会。

除花之寺聚会外，1830年六月，龚自珍请周凯、张祥河、魏源、吴葆晋等人在龙树寺集会，置酒谈心。

1835年9月9日重阳节，龚自珍在京的一大批同乡齐集于吴葆晋家，大家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并讨论时事政治。

1836年立秋，与龚自珍同年考中进士的庆勋召集自珍、马沅等人会集于北京积水潭，置酒高楼，面临碧波荡漾的潭水，大家饮酒赋诗，纵谈古今。

此外，每次遇朋友来京，或在京朋友离京去他乡，也都要聚会迎送。

在这些聚会中，名目不同，但是常常是政治集会，大家在一起议论朝政得失，交流各人对国家大事、治国安邦的看法，共商对策，有一些著名的奏章也正是在这些聚会上由众人共商而写的，如黄爵滋所上的那份著名的主张严禁鸦片的奏折，正是在一次聚会上由几位朋友起草的。

除参加这些聚会，龚自珍还爱一人独游。一次他乘驴车去丰台游玩，在一片芍药花深处席地而坐，在路边拉过一个短衣人，两人边饮酒边聊天，酒酣耳热，谈得畅快至极，龚自珍就引吭高歌起来。恰巧，他的好朋友汤鹏路经此地，听着唱歌的人声音很熟悉，便循声寻来，拔开花枝走进去，看见两个入席地而坐，满头满身都是落下来的花瓣，正在那里高歌，不由连称自珍雅兴好。短衣人见自珍熟人寻来，起身告辞而去，自珍又拉住汤鹏再饮酒。汤鹏问短衣人是谁，自珍却笑而不答。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要谈得开心，交个朋友，又何必一定要认识呢？

龚自珍在京师所交的朋友，大多是学者、文人，大家都爱讲求经世致用，主张改革，有同样的报国壮志。

如相知甚深的湖南人魏源，治今文经学，喜谈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一直主张革弊政，图自强，对漕运、水利、盐政、边防、鸦片这些当时大政大事有比较深刻的见解。自从与龚自珍定交，多年之间，二人在京则常相见畅谈，谈人事、谈学问、谈国事，若不在一起则二人常互通音讯，互致问候，交流思想感情。正因二人有比较深的交往，思想上又比较接近，故后人一直以龚魏并称。

另外像包世臣、宋翔凤，他们二人是龚自珍的同年进士。包氏是安徽泾县人，治学广博，对影响时政的诸多问题都有深入研究，虽不为官，但他住在南京时地方官常要向他请教漕、河、盐及军事问题。宋翔凤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庄存与的外甥，也治今文经学，与龚自珍有较多的共同语言。

此外，他的朋友中有不少是这时日益突出的鸦片问题讨论中的禁烟论者，像黄爵滋、汤鹏、王鼎等人，都主张清政府应颁严令禁止鸦片的输入。与他们交往，使龚自珍对鸦片问题认识日益丰富，为他后来向林则徐提出十大禁烟意见提供了条件。

六、“我有阴符三百字”

一般人认为可作中国近代史起点的鸦片战争是直接由鸦片问题引起的。从“罌粟”果实的汁液里提炼出来的鸦片，开始时作为药品传入中国，后来又传入对人身体有害的吸食法。久食成瘾，使人意志消沉，身体衰弱。英国殖民者为了改变他们与中国贸易中的长期出超地位，遂将鸦片这一罪恶毒品贩卖进了中国，妄图用它打开中国大门，从中国赚取他们垂涎已久的巨额财富。开始时规模不大，一年只有几百箱，主要贩往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吸食的人也不太多，所以还不大为人所注意。然而只经过几十年，鸦片就从沿海漫延到中国内地，吸食的人越来越多，上至高官，下至百姓，全国各地到处被鸦片毒烟所笼罩。贩卖进中国的鸦片数量也越来越大，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殖民者走私贩卖到中国的鸦片已高达5万多箱。鸦片像一个大毒瘤，给处于衰败中的清朝社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而泛滥成灾的鸦片贸易问题也就很快成为清朝举国上下一致关注的一大问题。

在清朝内部，官僚和士大夫对鸦片问题有不同看法，由此形成两派：弛禁派和严禁派。1836年，太常寺卿许乃济在上给皇帝的一份奏折里说，政府应该承认鸦片为合法贸易品，准许输入销售，政府可在中间收税，从而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处于困难中的财政收入问题。他的看法得到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善的赞同。是为弛禁派。

与此相反，另一些官僚则坚决反对鸦片贸易合法化。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认为鸦片烟输入越多，吸食的人越多，白银的流量就越大，银价越来越贵，使税收困难，老百姓生活受到严重损害，长此下去，将会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所以他主张严禁鸦片输入，重惩吸食之人，使之尽快戒烟，前堵来源，后断其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他的这一意见得到林则徐、龚自珍、魏源、汤鹏等一大批有识之士的支持。是为严禁派。

由于鸦片问题争论激烈，在龚自珍所参加的京师各次聚会上，这一问题越来越多的成为他们讨论的话题，后期的许多次聚会，大家讨论的主题便是鸦片入侵和禁烟问题。经过多番讨论，龚自珍和他的朋友们一致认为只有坚决禁烟才是真正正确的选择。

道光皇帝在这场讨论中一直摇摆不定，随着鸦片所造成的问题日趋严重，他终于向群臣下谕旨，让部分总督巡抚大臣发表意见，视情况再作决定。朝旨颁下，湖广总督林则徐很快上奏，他完全赞同黄爵滋的严禁主张，他指出如果任鸦片泛滥，不用多少年，中国将无可可用之兵，无充饷之银。同时他还介绍了自己在湖广禁烟的措施和成绩，认为必须禁、可以禁，看到鸦片泛滥将危及清朝统治，道光皇帝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他召林则徐入京，经过多次面谈，他终于同意林则徐的禁烟主张，决定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是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的好朋友，因为这一点，所以龚自珍一直将年长自己7岁的林则徐视为长辈和老师。早在1822年，龚丽正与林则徐曾同被皇帝招见，后二人结伴南下，结下深厚友情。从那时开始，林则徐也与龚自珍交上了朋友。龚自珍在京主持龙树寺集会时，适逢林则徐入京，此后的3个月时间里，二人常在一起讨论时政，切磋学问，林则徐对龚自珍的才华颇为欣赏，而他们在鸦片问题上更是见解如一。

此次道光皇帝召见林则徐询问禁烟问题，龚自珍想与林则徐深谈一次，

但林则徐太忙，每见面周围人又多，不能长谈。现在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为表示支持，同时也想为林则徐处置禁烟一事提供参考性的意见，遂连夜草书，写下《送钦差大臣候官林公序》，送给林则徐，为他南行壮行。

在这篇文章里，龚自珍全面阐述了他对禁烟问题的看法，献上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三种“归墟义”。

在第一项“决定义”中，龚自珍主要谈论货币问题。他指出从明至今，由于产银极少，故银两的量基本上不增加。即便不外流，同于其他方式的损耗，每年全国将减少三四千两。现在由于鸦片输入，白银外流严重，如再不设法制止，中国将很快无银可用，那样的话，整个经济都将瘫痪。所以制止白银外流是头等大事。

第二项“决定义”是关于惩治吸食贩卖鸦片人的。他认为吸鸦片即“食妖”，对戒不掉的人当处死，当兵的吸鸦片影响军队战斗力，应加重惩处，对贩卖制造也一样。

第三项“决定义”是要断绝鸦片来源。现在鸦片已成为外国人和贩卖人的一大财源，禁烟便是断他们的财源，他们肯定会捣乱，会反抗，所以他认为林则徐应带重兵，随时镇压。

说过三种决定性的意见，他又提出三种参考性的意见（旁义），一杜绝进口钟表等奢侈品，二是迁外国人于澳门，各地只设一商馆，三是调拨能工巧匠，整修军事装备。

龚自珍深知，自己和林则徐都是严禁派，禁烟肯定会有人反对，有人从旁非议，他设想了三种反对意见，并一一加以解答。

一是某些迂腐的文人会重弹食急于货，认为生产粮食才是根本，银子本是未物。对此可答情形不同，现在是要制止白银外流，而不是谈论食急于货的时候。

二是有些人反对禁止进口钟表等奢侈品，认为那样做将减少关税收入，这是他们不敢公开反对禁烟而发的议论。可以告诉他们关税减少无损全国经济，禁烟与杜绝奢侈品进口，对国家损失小而好处大。

三是反对用兵的意见，龚自珍认为禁烟用兵是为了驱赶敌人，防守海口，惩治不法商人，不是开拓疆土，谈不上启边衅问题。

最后，龚自珍总结性地指出，他希望林则徐通过禁烟，在不长时间内，让全国各省银价恢复正常，物产充实，人心稳定，使全国出现长治久安的局面。

读到龚自珍的信，林则徐十分感动，在复信中，他大加称赏。同时也对禁烟会不会最后成功表示疑虑，因为这并非个人能决定的，最终还要看最高决策人道光皇帝的态度。

送走林则徐，龚自珍的心也随之飞向南方，他真想与林同去参加这一禁烟壮举。此后他经常打听南方禁烟情况，并不断思考如何深入开展禁烟运动一事，但一时内新的计谋还不能告诉林则徐，他深感惋惜。他在诗中写道：

故人横海拜将军，
侧立南天未成勋。
我有阴符三百字，
蜡丸难寄惜雄文。

深沉的报国之情在诗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七、辞官南归

林则徐去广东禁烟不久，龚自珍在北京的生活就发生了变故，他因故被罚俸，没有俸禄，给他本已不宽裕的经济带来很大困难。由于交不齐房租，房主天天敲门讨债，搅得龚自珍全家不得安宁。龚自珍自感斯文扫地，十分狼狈。

走投无路之际，妻子何氏提醒他，还是去求老朋友帮忙吧。为借一些钱度日，龚自珍离京西行三百里，来到保阳道，向老朋友直隶布政使托布浑求助。见面后托布浑十分热情，应龚自珍要求给了诸多帮助，并留他小住。这使龚自珍十分感动。

1839年春，自珍叔父龚守正调任礼部尚书，按例龚自珍当引避。龚自珍自感在京生活14年，仕途不顺，生活坎坷，心绪不佳，又加上多年离乡，十分想念南方，父亲退职后在家，也已年岁很大，需要奉养。就以此为借口，向朝廷辞官。

4月，龚自珍未带家眷，独自离京南下。

离京前夕，闻讯而来的十多位朋友一起置酒为他饯行，他一一赠诗表示感谢。

出都门，坐在骡马大车上，回望京师，想想自己在京城这么多年的生活，一种恋恋不舍的感情油然而生，“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既然已下决心回故乡去，那就把自己的遗憾，自己的幽怨和实现、未实现的青春梦都留在那儿吧，也许以后还能“化作春泥更护花”，为后辈们作一些有益的事。

坐车南行了一段路，不久换船，开始沿运河顺流南下。眼望北国春色，再看黎民疾苦，自珍心中国事、家事和个人生活经历，不论是现实的还是已然过去的，都涌上心头，他的诗情如破堤而出的洪流，再也控制不住。于是他不停地写诗，写回忆，写感想，写现在所见的人和事，心里出现什么，笔下就写什么，写好之后，把诗笔一卷，投入一个大竹筐中，长达315首的大型组诗《乙亥杂诗》就这样一首又一首地诞生了。

一路南下，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6月初，自珍抵达扬州。他停了下来，弃舟登岸，进了扬州城。先住在一家旅店里，后被魏源请去，住进魏的寓所“挈园”内的“秋实轩”里。虽然他这一辈子没做过大官，但他的才华早已在江南士人中广为传诵，很多人对他欣慕不已。他在扬州还有不少老朋友，他们听说龚自珍来到扬州，便纷纷赶来看望。于是在魏源的“挈园”里，每天从城内外赶来很多人，有的来向龚自珍请教学问，有的人来请龚自珍评定诗文，有的人请他写序、写跋、写祖先父兄的墓志铭，有的人来向龚自珍打听自己在京为官的亲人的近况，常常门庭若市，十分热闹。这些日子虽然很忙，但龚自珍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舒畅，他被压抑得太久了。

心情一好，游兴大增。在这段时间里，他几乎游历了扬州城内外的每一个景点。弃舟登岸的第二天，清晨，他便过小桥，登上矮墙，见扬州城在小雨后别有江南小城的一番景致，遂去街市买回一些菜，老朋友又送他一坛酒，一筐虾。到了夜晚，他吃着虾，喝着酒，十分高兴。喝到高兴时，便倚窗而歌，吟咏诗句，引得街下四外很多人出来观看。他的这一番不拘形迹、醉酒吟唱的行为第二天便传遍扬州城，人们都把这作为一件风雅的事津津有味地来谈论。

在扬州住了一些日子，龚自珍告别朋友，前往与扬州隔江相望的镇江。

到镇江，正赶上当地在举行赛玉皇和祭祀风神雷神的大典，道士中有人早听说龚自珍是江南一大才子，今日碰见，就请他写一份“青词。”原来，按道教教规，每年在“玉皇大帝”诞辰这一天，都要在各道观中举行“赛神”仪式，到时候，善男信女们都赶来祈祷祭祀，求神消灾免祸，保佑平安。在祭神活动中要写祭神文，因为是用红笔写在青藤纸上，所以叫“青词”。道士很热情，龚自珍没回绝，提笔写下一首诗，这就是那首传诵很广的名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别人求神拜佛不过为了消灾进财，龚自珍在“玉皇大帝”和风神雷神面前，他什么也不求，他只愿神州多涌现一些人才，好让国家改变今日衰敝状态，振兴起来。这首诗大气磅礴，雄健高朗，呼声直上九霄，是龚自珍诗作中的一篇杰作。

过了镇江，往东南行，7月初九龚自珍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杭州。陪着父亲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8月18日，他陪父亲去看多年未见的浙江潮。9月，他从杭州去昆山，在那里安置住屋，准备家人南来后住在这里。

收拾妥当，立刻动身北上，前去接家眷。10月到达山东，他专门绕道来到曲阜，到孔庙拜孔子。到直隶任丘（今河北），他停下来，派一名家人赶往北京接妻儿。后来又北上，驻车固安，离北京还有120里。他始终不想再进京，那儿他经历的痛苦太多了，他不想去，怕触景生情。家眷离京来到龚自珍停留旅店，一番问候，然后即向南方进发。一路龚自珍并带他们四处游览，这样年底回到昆山住处。安顿好眷属，此后他便在江南苏杭这一带来回穿梭，没有再离开。

回来后他整理辞官南归途上所写的诗，编成《乙亥杂诗》。印成册后，分赠友好，朋友看后，纷纷赞叹不已。

转眼新年过去，已是1841年，龚自珍前往丹阳，担任云阳书院讲席，3月，父亲去世。龚自珍赶回家料理丧事。事后，仍赴丹阳担任讲席。龚丽正去世前，多年来一直任杭州紫阳院讲席，这时便由龚自珍继任。8月再赴扬州，访魏源于挈园。同月12日，突然发病，在丹阳去世。终年49岁。

龚自珍生活在一个转折性的时代，清朝正处于崩溃瓦解中，旧的在毁灭，新的还没有生长出来，生活在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前夜，龚自珍既幸运，又不幸运。幸运的是他看到旧制度下腐朽没落的现实，故而发出了很多的深刻的批判；不幸的是他没有看到新制度、新时代的面目，没有来得及接触西方近代文明，因而他在批判旧时代的同时，只能贩古时丹，找不到更好的出路，从而常处于矛盾痛苦之中。

正因为这，所以龚自珍没有像外祖父段玉裁那样专心致志地研究汉学，做训诂考据文章，他一生涉及金石、小学、史学、地理、文学、经学各个方面，治学范围极广，综罗百家，时有新意，但是他每一门学问都不深。所以后人梁启超批评他“病在不深入”。

然而，在近代历史上，龚自珍主要是以一位思想家、诗人的形象出现的，作为批判旧时代的一员健将，他的诸多犀利尖锐的议论批评开启了一大批中国有识见的知识分子的大脑，他的改革号召引导了很多人走上改造旧社会的

道路。他的诗，悲愤激越，意境辽远，具有很高的成就。用这样诗文笔法，鼓之以充沛的热情，龚自珍的思想影响力更大，而他的文字更直接导致后来的诗界革命。“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为整个新时代开了风气，作为时代的先驱者，他影响了以后几代国人的生道路。

